

錢賓四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

戴景賢 著

東方出版中心

錢賓四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

戴景賢 著

東方出版中心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/戴景贤著. —上海:
东方出版中心, 2016. 2

ISBN 978-7-5473-0883-7

I. ①钱… II. ①戴… III. ①钱穆(1895~1990)—
人物研究 IV. ①K825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62935 号

图字: 09-2015-977 号

©香港中文大学 2014

本书由香港中文大学拥有所有版权
本版限在中国大陆发行

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(021)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×1020 毫米 1/16

字 数: 419 千字

印 张: 31.25

版 次: 2016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3-0883-7

定 价: 68.00 元(精装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: (021)52069798

《程学阁著作集》发行缘起

余自幼性喜文史、哲理，于文学与人生之关系，以及人道义理之应有，种种探讨，概多得自慈亲之启迪；余日后覃思深虑于文化之诸多议题，每具一种历史与文明空间之理解与想象，其源盖出于此。而余自所披览，浸染之深者，则以西方近代哲学与文学之名作为主。其间尤深受感动者，为十九世纪以迄二十世纪初欧洲文坛之长篇巨著，乃至十八世纪以来西方之音乐与视觉艺术等。然自读存在主义之著作，如加缪《局外人》之类，价值观备受冲击，遂若陷于虚无。苦恼之极，乃转向儒学之性理，由此定志。时为高中第一年之季末。此后自学益勤，而于经史亦多涉猎。未久，余以父执辈之介绍，得从游国学大师名史学家钱穆宾四先生；每周请益，前后逾二十余载。由是始深识中国旧有学术之规模，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襟抱。而成长之过程中，余朝夕念虑与关怀所集，则多不离于思考人类文明前途与人文学术之未来。

反观过往，余自入上庠以来四十余年，治学之取径，始则专力于经史、性理，于古今学术，渐窥门径；进则复肆力于西方近代之学术与思想，于中国现代所遭遇之难题，与中国学术应有之调整，由是遂了然于心。四十以后，事理渐次融通，谓能“因于所是，而别得‘非是’之是”，亦自以为安矣；而昔日之焦虑尽去。不意于一偶然之机缘，因坐而得悟，乃知人之智慧，别有登境；以思辨为条理者，有见、有蔽，不能离于所执。宗教之理，虽可依哲学为说明，然非循哲学者，所可尽明。自是而后，遂兼修大乘之显、密，于佛法所辨“识”、“智”，亦若有得。五十以后，前所积蕴，触机皆有所进，而著作亦已盈篋。遂于壬辰，西历二零一二年，余六十二岁之年始，集所成稿，交付香港中文大学，逐年付梓。所著书，凡十三种，共二十六册，颜曰《程学阁著作集》。“程学阁”者，余书斋之名，盖自取“程日百驾，学耕千畴”之意；义略近于

明季大智禅师方密之所自期。而其目，依序则为：《明清学术思想史论集》、《王船山学术思想总纲与其道器论之发展》、《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》、《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论集》、《宋元学术思想史论集》、《中国学术概念产生之历史时刻与其条件》、《先秦两汉学术思想史论集》、《三国两晋南北朝学术思想史论集》、《隋唐学术思想史论集》、《中国政治思想史论集》、《中国宗教思想史论集》、《中国社会思想史论集》、《中国美学思想史论集》；预计可于十二至十五年间全部刊行。今《明清学术思想史论集》、《王船山学术思想总纲与其道器论之发展》两种，计四册，业已问世，因简叙出版之缘起如上。

岁次癸巳右翁自记于高雄鼓山区美术馆畔之程学阁



一九八五年，作者与宾四先生合影于台北县钟氏茶园

无锡钱穆宾四先生学述^{*}

前 言

中国现代经历有史以来少数最剧之巨变。此巨变，最初系由中国与欧洲列强不均衡之政治、经济形势所引发；而最终，则成为中国面对未来文化发展时，所不得不作出之社会整体结构之调整。就时代之划分言，目前，乃至往后之数十年，中国仍将以此为其主要之发展趋势。而于此迈向“逐步现代化”¹之痛苦过程中，中国之智识阶层，承受同时代其他社会中知识分子所未可比拟之压力；亦面对其自身所未曾经受之历史困境。因中国乃转聚人类历来最众多之人口，结构历来最庞大之社会，而于此中国之转成与绵延中，中国亦缔造出其特有之文明形式，与其特有之社会结构方式；并凝聚成其特有之文化精神。故一切现实问题之解决，皆无法逃离此一文化大环境所给予之条件与限制。一切清末以至民国初年以来之文化更新、文化改造之呼声，皆不外反映出作为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时代问题时，所不得不有之历史反省。钱师宾四（穆，1895—1990）先生一生之学术，即在此一时代之大环境中缔造，亦是针对此一时代之问题而思考。

一、《先秦诸子系年》

钱先生一生第一部重要之著作，为《先秦诸子系年》。²其正式出版，在一九三五年，着手起草，则始自一九二三年，历时约十三年。而

目 录

《程学阁著作集》发行缘起	1
壹 无锡钱穆宾四先生学述	1
前言	1
一、《先秦诸子系年》	1
二、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	13
三、《国史大纲》	19
四、《朱子新学案》	24
结语	28
贰 钱宾四先生所关注之时代问题与其学术取径	56
一、钱先生所处之时代与当时之学术环境	56
二、钱先生所企图解决之学术难题及其主要工作	71
三、钱先生义理思想之根源及对此可有之哲学解释	87
四、钱先生之学术观念及其所显示之学术史意义	110
叁 论钱宾四先生“中国文化特质说”之形成与其内涵	187
一、钱先生学术中之“家言特质”与其价值思维之整体性	187
二、钱先生有关学术、思想、文化研究之关切焦点与其“中国 文化特质说”之提出	189
三、“文化特质说”建构之条件与其史学意涵	191

四、钱先生“中国文化特质说”之来历与其思维架构	196
五、钱先生“中国文化特质说”所可能具有之启示意义	200
肆 论钱宾四先生之义理立场与其儒学观	220
一、钱先生义理思想之根源与其哲学意涵	220
二、钱先生之义理形态观与其对于三教之分疏	227
三、钱先生诠释中国学术史之基本角度与其研究重点	232
四、钱先生针对经学、理学、儒学所设立之义界区隔,与其 时代划分	236
五、钱先生义理立场与其儒学观之于当时以及未来之 重要性	242
伍 钱宾四先生有关历史与人性之理解及其学术意义	260
一、钱先生对于人类生存条件及历史构成之理解	260
二、钱先生对于社会构成之结构因素、功能因素与精神 基础之基本分析	266
三、钱先生有关民族与文化关系之说明	269
四、钱先生对于历史目标与进程之看法	272
五、钱先生所企图建立之文化形态学	275
六、钱先生史学中之哲学成分	279
陆 论钱宾四先生研究历史之角度与其建构史观之过程 及方式	306
一、钱先生研究历史之双重角度与其形成之来源	306
二、钱先生有关历史发展之“主体性建构”之设论与其 当代意义	309

三、钱先生“史学观”中之动态论与静态论	316
四、钱先生“史学论”中之分野观	321
五、钱先生“史学系统”之完成与其史学工作	324
柒 钱宾四先生学术思想之总评价	344
一、钱先生学术思想于学术史之贡献	344
二、钱先生所形塑之学术风格与其启示意义	349
【附录】	
一 流落人间者,泰山一豪芒 ——从学宾四师二十二年之回忆	361
二 无锡钱宾四先生事略	371
三 钱宾四先生著作版本目录	374
人名索引	386
书名篇名索引	393
语词语句索引	411

无锡钱穆宾四先生学述^{*}

前 言

中国现代经历有史以来少数最剧之巨变。此巨变，最初系由中国与欧洲列强不均衡之政治、经济形势所引发；而最终，则成为中国面对未来文化发展时，所不得不作出之社会整体结构之调整。就时代之划分言，目前，乃至往后之数十年，中国仍将以此为其主要之发展趋势。而于此迈向“逐步现代化”¹之痛苦过程中，中国之智识阶层，承受同时代其他社会中智识分子所未可比拟之压力；亦面对其自身所未曾经受之历史困境。因中国乃转聚人类历来最众多之人口，结构历来最庞大之社会，而于此中国之转成与绵延中，中国亦缔造出其特有之文明形式，与其特有之社会结构方式；并凝聚成其特有之文化精神。故一切现实问题之解决，皆无法逃离此一文化大环境所给予之条件与限制。一切清末以至民国初年以来之文化更新、文化改造之呼声，皆不外反映出作为中国智识分子面对时代问题时，所不得不有之历史反省。钱师宾四（穆，1895—1990）先生一生之学术，即在此一时代之大环境中缔造，亦是针对此一时代之问题而思考。

一、《先秦诸子系年》

钱先生一生第一部重要之著作，为《先秦诸子系年》。²其正式出版，在一九三五年，着手起草，则始自一九二三年，历时约十三年。而

于此先、后之十余年间，中国文史学界存在一股主要之思潮，即有关古史之“辨伪”运动。此项运动，就实际所牵涉之学术问题而言，颇多乃承袭自清末；然于观念、方法及目标，有一并不同于前人之要点，即彼时学界所欲辨订之“伪”，不仅限于辨析史料中之“伪”，而更在辨析“史料”背后，其所依据之“历史观念”之“伪”。³此种“辨伪”之法，若就“史观”与“史料”之密切关系论，有事实上之困难。盖论史者若不能超离于原本建立史观之材料，另有一可以建构新观点之途径，而仅凭史料间之比勘，实际并无法检视其“观念”之自身。当时学界之所以引发此项运动，有一主要之因缘，即是进入十九世纪以来，西方学界借“比较方法”与“考古方法”所获得之有关“人类历史文明演进”之知识，与解释之理论。故有向来为人所深信不疑，且为许多思想、价值观念所依凭之历史观点，至此皆发生根本之动摇。⁴其中最重要者，约有二项：一为关于“唐虞、三代”之传统论述；而另一，则是若干与“中国学术思想之产生与发展”相关之基本观点。

就前项言，历来之理解，皆系依据汉人所汇集之“六经异传”与“百家杂语”整理而成；⁵其说法，若以“历史演进”之角度视之，有可信，有不可信。史料之整理，需要建立一新的评判之标准。就后项言，汉人所谓“九流十家”之分野，亦应以一新的整体学术史之眼光，寻找出其彼此间相互影响与前后承递之关系。⁶钱先生《先秦诸子系年》一书，主要即针对第二项问题，择定其研究之议题。⁷

当时学界关于先秦学术发展，有四项视为重要之发现：一、先秦本无所谓“名家”，名家实即墨家发展中后起之新派；二、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列“法家”，书多难凭据，是否有“法家”之存在，须重新检视；三、传世本《老子》一书，乃战国晚出而托名于老聃者；四、“阴阳”、“五行”之原始观念，与阴阳家学说之成立，关系先秦子学之发展甚深；应自“观念史”(history of ideas)之角度，加以考察。其中第一、二项，发自胡适之，提出在前；⁸而三、四两项，则与梁任公(启超，字卓如，1873—1929)关系较深，其提出在后。⁹

大体而言，名家之基本性质属墨，此一点为当时学界所大体承

认；¹⁰其研究基础，在于《墨辩》与惠施、公孙龙思想之比较。至于《老子》一书著成之时代，梁、胡之意见则颇相左。此问题，一方面牵涉老聃其人之史实问题，¹¹另一方面则牵涉《老子》一书中思想所反映之政治社会，其时代之特性究竟为何之问题。其前项，因有史料之限制，抑且性质上可另成议题，故重点在于后者。盖就思想之关系言，《老子》书若早出，在孔子前，如胡适之说，则形上思想与名学思想，自始即结合于“老子”一家之言中，为先秦哲学开创时之结构性基础。若然，则以老子哲学之发生言，必须解释其思想与同时代一般观念，彼此间思维水平之重大差异，系如何跨越？而其书中所运用之特殊哲学用语，与针对议题而有之高度“哲学化”之思辨方式，又如何能于一时之间，由一人独力完成，且于哲学建构之完整性与严密性上，为此后众多之先秦思想家所远不能及？至于“道”字与“名”字二观念，各家间所应有之承递关系，亦须有具说服力之说明。若《老子》书系晚出，如梁任公说，则中国先秦思想中“形上思想”与“名学思想”之间之发展关系为何？道家思想之来历如何？《老子》书与《庄子》书思想孰先孰后？《易系传》思想之性质如何？亦必连带须重新加以考虑。而在政治思想与形上思想、名学思想之间，亦若需要重新判别出一可加以联系之线索。

钱先生考论诸子，主要立基于下列数点：一、诸子应渊源于孔子；二、《易系传》非孔子作；三、传本《老子》书当出于庄子之后。此三点有一最要之关键，即是名家与道家之关系。盖胡适之“名为新墨”说，虽当时学者视为确论，胡氏于墨家先、后之转变，则尚有一连带之说法，即前期之墨，乃宗教之墨学，而后期之墨，为科学之墨学。前期墨家言“天志”，是否即证明其性质属宗教？而后期之墨家于知识之方法上近于彼所谓“科学精神”，是否即可称之曰“科学之墨学”？胡氏书中对于先秦思想之背景，主要乃据《诗经》立说，对于春秋、战国社会阶层之升降，与政治结构之转变，未有详细之分析；因此所谓“宗教”、“科学”云云，并未找寻出“墨”之所以为“墨”与“名”之所以为“墨”之根本特质。钱先生于《系年》成书过程中，先写成《墨辩探源》

一文，主要乃确立《墨辩》中之思想系为证成墨家“兼爱”之理论而有，其发生之根本原因，盖为墨家原始“天志”之理论无足以折服学者之诘难，故造为此新说。¹²此点即基本上认为墨家之思想，乃系以“政治”为其主要之着眼点；无论前期与后期皆然。而先秦学术中“儒”、“墨”之分途，实即以其互异之政治主张，影响其活动，而造成此派别。故《系年》中卷一、卷二，即以孔子与墨子时代之前后为起讫，以之作为考论当时社会背景、政治活动之主要纲领。¹³其论中以儒、墨之名，乃起于身份标识一项，即可显示其观察之角度。¹⁴

而以民初当时考论之状况言，“名”之所以为“墨”之性质，既已视为确立，则《老子》书中“名”字之概念使用，应于先秦思想发展史之线索上，占如何之地位？即应进一步推求。盖《老子》书中有一最要之观念，即“道”。而传本《老子》第一章之言“道”，曰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基本上即与“名”之问题结合讨论；故续云“名可名，非常名”。¹⁵然名家之言“名”，皆与人之“意指”相比论，并未论及“不可名”、“不可道”者，如《老子》书中所指。《老子》书之作者，显已习闻名家之论，故更而上之，以超绝名言者为说。决不当《老子》书已先出，名家之徒晓晓然相与辩，而不一语及其义。且儒、墨言“道”与“义”，皆切近人事；儒家言“道”而有玄义近于《老子》，仅有传为孔子所作之《易传》。然其书不唯自宋以来即颇有疑其非孔子作者，¹⁶如以梁氏“阴阳家乃后起”之说法考察，则其晚出之痕迹，殆若益显。而梁氏同时又有文考论“天道观念”之历史变迁；¹⁷其言虽简要，然“道”字之观念见于《诗》、《书》与《左传》者既如此，诸子书中关于“道”义之讨论，亦当有一合理之发展顺序。钱先生后又写成《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》¹⁸一文，大体即循此线索，从而判定《老子》成书之必出于名家之后。¹⁹

传本《老子》书之当晚出于名家后，不即足以说明道家与名家之关系。钱先生文中又涉及一问题：即《老子》书与《庄子》书之先后问题。庄子与老子论学之宗旨，有重要差异，而《庄子》书中外、杂各篇，亦有“近老”与“近庄”之不同，此论出王船山（夫之，字而农，号姜斋，1619—1692）。²⁰钱先生既确认《老子》书晚出，且当在名家后，而庄子

本与惠施为友，亦受名家影响；则《老》之与《庄》，孰当在前，先出，孰当在后，迟出，牵涉道家思想之起源，与道家思想核心之义系如何形成之问题，不能不加讨论。钱先生于此有一独出己见之新论，即《庄子》内七篇当出今所见传本《老子》前，而为道家本源之说。

梁任公曾有一论，谓道家哲学有一与儒家根本不同之处，即儒家乃以“人”为中心，而道家则以“自然界”为中心；儒家重人类心力，而道家则重自然界理法。²¹此若就认定《老》、《庄》乃同属战国思想之观点推论，即可谓儒、道此种立论重心之转移，代表先秦思想由人生论逐渐扩及宇宙论²²之一种发展。因此对于“天”与“人”间关系之探讨，应即为此种思想发展内在之趋向。钱先生关于《庄》、《老》之先后问题主要即于此着眼。而其所择出讨论之观念，除“道”与“名”之外，计有“帝”、“天”、“地”、“物”、“大”、“一”、“阴”、“阳”、“气”、“德”、“有”、“无”、“自然”、“象”、“法”诸辞。²³其中尤为重要者，在于论“物”一节。

盖“上帝”观念之逐渐淡化，乃先秦思想之大趋，此语仅可论大，未能及细。至于“物”之成为思想辨析之对象，而与人之心理对立讨论，则在认识论(epistemology)上具有特殊之意义；其先盖出于名家“名”、“实”异同之论。钱先生将庄子论“物”区分四义：即“讨论物之来源者”、“讨论物之情状者”、“讨论物之法则者”与“讨论对物之应付者”。²⁴就此四义言，庄子立说之重点，在提出“物化自然”之观念，而其本旨，则在破除人心依于“外物有常”而建立之知识观点。至于其立说之所针对，则有一明确之目标，即儒、墨之相争。然庄子，依钱先生之说，并未外于儒、墨之认知方法，另建立其积极掌握知识之一套新途径。故其说虽已略有“道”为“物化”所本之观念，并未进一步依据物化之运行，而籀离出一可循之公例；如《老子》所言。故就“应物”之态度言，庄子仅言随顺自然而与时俱化，并不似《老子》之超然燕处，而常有“取天下”之志。今若就名家、庄子与老子对于知识方面之态度比观，道家所承受名家影响而递变之痕迹，盖若可以确立。

钱先生此说，可谓将船山判别“老”、“庄”异宗之意，配合进梁任公所言儒、道思想变迁之大势，而得出一当时颇见为深刻之看法。²⁵此

一看法,以今日之眼光视之,虽由于有关道家起源问题,学界已有不同于当日之研究基础,因而可凭以论述之条件已有改变;²⁶然即以此论,钱先生所提示之有关道家文本与名家间可能之关联,仍为一不应忽视之论点。

除此之外,钱先生考论《庄》、《老》思想之发展,又获得一重要之思想线索,即是关于“象”字与“法”字之观念,系如何“理论化”之历史途径。此一考论,基本上即梁任公“道家重自然界理法”意见之发挥;而由《庄》、《老》两书知识态度之进展,得出一自成其说之脉络。综括而言,此说之重要性,在为道家与阴阳家之发展,彼此间如何取得一观念与思想之联系,因而使阴阳家结合“阴阳”、“五行”诸观念而亦成功一学说之原由,获得一属于“思想史诠释”之可能。

以上所述为《先秦诸子系年》成书过程中,于思想探索上大概之进程;基本上,可谓已将当时学者所提出之新论点,于一家之说法内,组织成完整之系统。²⁷而配合此一重新建立之思想脉络,《系年》有一极宏伟之工作,即是史料之组织与考订。

战国史之研究,本非当时考辨古史之重点,盖春秋以后之中国史,已进入文献较丰之时代,非远古仅凭传说可比。孔子《春秋》据史官所记系年成书,已为历史研究奠立坚实之基础。而战国之史料,因有司马迁《史记》之《六国表》,作为考订之凭据,所谓“疑”、“信”,盖仅限于个别之史料或史实,并不牵涉“论述历史”时之整体观点。当时对于战国史研究之风气,实际乃由“学术史”方面特定之问题所引发。

而就当时学界之状况言,论思想应注意“史料”之鉴别,与“时代背景”之考求,而以客观态度,加以系统之研究;此方法本是胡适之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一书所提倡,对于当时学界有莫大之影响。而胡氏书中亦于其实践方面,具有不可磨灭之成绩。²⁸唯胡氏书中对于时代背景之考求,仅由老子、孔子上推其前二百年之大环境,而其所据,则主要为一部《诗经》;对于春秋、战国之特殊环境,乃至此环境与当时学术活动间之关系,并未有足够之历史分析。²⁹故逮梁任公举出《老子》书中显见之战国观念与用语作提示,日后遂激起学界热烈讨

论“战国史”之风气。而梁氏本人较后著之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一书，亦为研究战国学术与政治间之关系，建立数项基本之观察点，即：“政治与伦理之结合”、“封建及其所生之结果”、“阶级制度兴替之状况”、“法律之起原及观念”、“经济状况”等。³⁰此数项，除第一项外，胡氏书中皆曾提及，唯未有实地之研究。梁氏由于其敏锐之历史眼光，故于此诸项问题，实际已替代胡适之，导引以下研究之方向。

钱先生关于战国史料之组织与考订，除历史宏观视野与思想史之线索外，有一最基本之工作，即是《史记·六国表》之修订。³¹《六国表》出《秦记》，秦自孝公以前，僻在雍州，不与中国之会盟，故载六国事多疏，且与《史记·世家》文多牴牾；其中有若干致误之关键，由于缺乏完整可信之凭据，始终难以校考。因之谱诸子行事年历者，于各家书中所涉及之史迹，凡事在春秋者，皆能经久而论定；可议者多属细节。其成绩较著者，有清初以来之阎百诗（若璩，号潜丘，1636—1704）、毛西河（奇龄，字大可，1623—1716）、全谢山（祖望，字绍衣，1705—1755），乃至其后之江慎修（永，1681—1762）、狄子奇（字叔颖，号惺庵）、林春溥（字立源，号鉴堂，1775—1861）等。而梁玉绳（字曜北，号清白士，1745—1819）之《史记志疑》，与崔东壁（述，字武承，1740—1816）之《洙泗考信录》，尤卓然成家，功不可没。至于考论墨子以下战国事，则反若纷乱而难理。其分别而求者，若皆能自成一说；合而会观，则参差立见。且亦无以定其是非。³²此乃原本积存于《史记》中之问题。至于《六国表》外，尚有晋太康年间发汲冢所得之竹书《纪年》十三篇，出魏史，亦有战国年历。唯因其言古事，多与儒说违异，为世所疑，其价值遂隐不彰。³³且其书宋时已失，今本乃后人辑其佚文而又依附于《史记》所成，真贋错杂，混同一例；是以其可资考信之价值已大为降低。清以来考论及此者凡数家，³⁴至朱右曾（字尊鲁，一字亮甫），始自《水经注》、《史记索隐》、《太平御览》及其他书中另辑出真本，从而表现其有印证诸子、校正《史记》之用。³⁵朱氏书后又得王静安之重视，³⁶为踵继其事，知者遂渐多。年历之参校，得此线索，已有一解决之途径。然仍需实地将诸子书中所表现之史事，于彼

此之间，或与其他史书之所载记，仔细推较，以建立一较为完整之结构；始是将《纪年》之价值，在当时已建立之学术基础上，发挥尽致。³⁷

钱先生考战国事牵动最大者，盖有二事：其第一事，则有关晋出公以下之世系年数。³⁸《史记·六国表》出公仅十八年，《世家》又云十七年。盖《史记》误以三家杀知伯事为四卿分范、中行事，故以十七年为出公出奔之年，而《表》乃于明年书襄子元年；且又误晋哀之元一年。据《史记索隐》于《晋世家》引《纪年》，出公奔楚，在二十三年，遂立昭公孙，是为敬公；而魏文之立，则在敬公十八年。钱先生据他处引《纪年》文推算，“十八”应系“六”字之讹，³⁹与王静安所推同。又考晋敬公、哀公、懿公乃一君三谥，⁴⁰而魏文为桓子之子，非孙；其元年为周贞定王二十三年，而非威烈王二年。⁴¹《史记》盖误以魏文更元之年，为魏文始立之年，遂遗其前之二十二年。实则“三晋命邑为诸侯”前二十二年，魏已称侯。⁴²其事亦如魏、齐会徐州相王之后，魏、韩又相王，又有五国相王。⁴³今若魏文之元前移，子夏居西河教授之前后事，即得详考。⁴⁴

盖因昔人以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，魏文初立，去孔子之卒七十五年，为大夫二十二年而为侯；若以始立之岁计之，则子夏已百三岁，不得为其师。⁴⁵今魏文初立，前移于周定王二十三年，去孔子卒三十三年，子夏年六十三，且云“为文侯师”，可以为后人追述语，不必定在称侯后；则事可信。疑孔子未死，子夏固已显名，至是则巍然大师。⁴⁶

钱先生又谓“子夏居西河”，地应在东方河、济之间，不在西土龙门汾州；⁴⁷就文教所兴，地亦较确实。钱先生续又重考魏文所礼贤，如田子方、段干木、魏成子、翟璜、翟角、吴起、李克、西门豹、乐羊、屈侯鲈、赵苍唐等，谓魏文以大夫僭国，故礼贤下士，以收人望，而邀誉于诸侯；游士依以发迹，实开战国养士之风。⁴⁸而诸贤中之尤有关系者，则为李克、吴起。

李克，子夏弟子，为中山守；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“李克七篇”，在儒家；《食货志》又云有李悝，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。《艺文志》又有“《李子》三十二篇”，列法家；班固（字孟坚，32—92）云：李悝。⁴⁹其实